

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研究实践新进展
——2021-2022 第六届生态文明与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学术
研讨会综述

Recent Advances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Parks and Protected
Areas in China: Summary of the 2012-2022 the Sixth Seminar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National Parks System

吴承照¹ 余和芯¹ 寇梦茜²
WU Chengzhao¹ YU Hexin¹ KOU Mengqian²

(1.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上海 200092; 2.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 200092)
(1.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092; 2. Shanghai Tongji Urban Planning &
Design Institute Co. Ltd., Shanghai, China, 200092)

文章编号: 1000-0283(2022)12-0004-07
DOI: 10. 12193 / j. laing. 2022. 12. 0004. 001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 2022-08-19
修回日期: 2022-11-14

摘 要

国家公园健康发展需要科学的理论基础、合理的制度设计和关键的技术支撑, 生态系统保护的
国际理念与中国特色的保护制度相结合, 全覆盖、全方位的智能化监测体系是现代国家公
园的一项基础设施工程, 以监测大数据支撑的智慧决策支持系统与智慧管理是国家公
园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以上海为中心的长
三角国际化大都市区需要与之匹配的国家公园和健全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支撑, 建设长
江口国家公园和太湖江南水乡国家公园不仅是生态系统保护的需要, 更是提升长三角地
区国际竞争力的生态动力需求。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基础的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是世
界经济发达地区共同的发展模式, 也是上海国际大都市不可缺少的二大标配。

关键词

国家公园; 自然保护地体系; 长三角经济区; 上海

Abstrac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parks needs a scientific theoretical basis, reasonable system design, and key technical support. The international concept of ecosystem conservation is integrated with the protec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mprehensive and all-around intelligent monitoring system is an infrastructure project of modern national parks. Intelligent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and smart management supported by monitoring big data are inevitable trend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parks. Shanghai, as the center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ternational metropolitan area, needs to match the national parks and sound natural protected area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of Yangtze estuary national park and Taihu lake Jiangnan-shuixiang national park is not just the need for ecosystem protection. More important is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Yangtze river delta ecological power demand. Integrated ecological and green development based on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is a common development model in the world's economically developed regions and also an indispensable standard for Shanghai as a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Keywords

national park; protected areas; Yangtze riverdelta economic region; Shanghai

吴承照
1964年生/男/安徽合肥人/博士/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家公园规划与管
理, 风景园林学理论与规划设计方法

余和芯
1997年生/女/重庆人/在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自然保护地规划与管理、景观规
划设计研究

寇梦茜
1983年生/女/辽宁沈阳人/硕士/规划师/
研究方向为野生动物保护、景观规划设计

2021年中国第一批5个国家公园正式设
立^[1], 标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结束, 开
启国家公园发展新时期, 预计到2050年建设
49个国家公园。建立国土空间完整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加快国家公园体制改革、推动国
家公园事业健康发展是当务之急^[2]。应对气

*通信作者 (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
E-mail: wuchzhao@qq.com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后续资助项目“国家公园规划与管理”(编号: 20FGLB014)

候变化提高国土空间生态韧性、储备未来发展资源维护国家可持续性、改善国民健康增强社会发展活力，自然价值观转变是出路，基于自然解决方案 (Nature Based Solution, NbS) 是关键选择^[3-4]，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是核心依托。自然保护地体系分全球体系、国家体系和区域体系，人与生物圈计划是全球保护地体系的重要支撑^[5]，各国根据自身生物多样性状态一方面加入人与生物圈计划，另一方面制定本国保护地体系。对于国土空间辽阔的国家来说，还需要建立区域体系，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区域生态安全。

1 国家公园理论基础、管理模式与自然受益型经济发展

(1) 国家未来的长远发展离不开优质生态环境的支持，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对中国生态安全具有重大意义，需要开拓性、创新性研究；National Park的“National”具有民族性内涵，国家公园是民族文化的象征，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其意义不仅仅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更具有文化意义：重振山河，建设美丽中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生态系统服务理论是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理论基础，国家公园规划需要整合多学科技术力量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货币化是国际学者共同关注的前沿课题，GEP核算方法纳入联合国统计核算体系，中国也在逐步开展GEP与GDP双统计核算体系，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为生态学、风景园林学提供非常广阔的实践空间。(吴志强、高翅、钟林生、刘颂、章明)

(2) 中国国家公园实行双重领导体制下的两种管理模式，即以国家林草局为主的管理模式和以省级政府为主的管理模式，每

个国家公园设置管理局—管理分局两级行政管理机构，管理分局可下设保护站，其为事业单位，属于支撑性机构。国家公园管理机构职责是负责国家公园范围内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包括规划、设计、政策制定、监督管理等，行使自然资源、林草等执法。建立中央与地方协调机制，国家公园局与相关省级政府建立协作机制，跨省国家公园设立协调办事机构，中央通过审核规划、制定标准规范、提出财政性资金安排建议、组织考核评价等，加强统筹协调，确保中央要求落地见效，省级组织协调，推动落实国家公园保护和管理的工作。以省级政府管理的国家公园，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开展派驻监督。(唐小平)

(3) 国家公园是真善美的综合体，“保护第一、人与天谐、全民共享、真善美生”是国家公园的基本目标。强化中央政府管理职责，国家公园局要成为名副其实、强有力的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治理枢纽，针对中国特有的问题和矛盾，创造性地走出中国自己的国家公园治理之路，创新国家公园治理理念和适应性技术，建构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治理体系，设立国家公园财政专户，集体土地要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目标兼容，社区共治，人融自然，社区治理方面的任何成功经验都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杨锐)

(4) 人类亟需优先应对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胁，发展自然受益 (Natural Positive) 型经济^[6-7]，在三个重要的社会经济系统中构建有益于自然的商业转型，粮食土地和海洋利用系统、基础设施和建成环境系统、能源和开采系统三大系统与气候变化影响79%的濒危或近危物种，到2030年，三大社会经济系统的15项转型在全球每年可创造超过10.1万亿元的商机和3.95亿个就业岗位。自然

损失使中国2/3的GDP和社会发展面临风险，根据2019年测算，自然损失占GDP的比重高风险为14%、中风险为51%、低风险为35%，自然风险的经济代价是9.3万亿美元。到2030年，15项自然受益型系统转型有望在中国创造1.9万亿美元的新增商业价值和8 800万个就业机会。投资三大系统15项转型所需的年化投资成本约5 350亿美元 (2019年价值)。(朱春全)

(5) 自然保护地评估分三个层级：全球、区域和保护区。全球尺度的评估重点是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实现程度和实施效果，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区域尺度的保护地评估重点是保护地连通性、区域协调性等；保护区评估重点是保护管理成效，包括保护地的整体效益和重要要素的影响程度，如森林保护成效的分析以及森林保护成效的重要影响因素、资金和科学研究水平等。保护地评估主体是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自然保护区管理评估规范》(HJ913-2017)与《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标准(试行)》(2020)是主要评估依据，原则上每5年开展一次。保护地评估方法需要不断创新，保护地保护目标与保护地基底状况是保护地评估方法选择的关键影响因素^[8-9]。(李俊生)

(6) 相对于美国国家公园的双重性，三重性是中国国家公园的重要特色，生态保护、游憩教育、社区发展是国家公园管理的核心内容，西方国家公园经典管理模式VERP需要调整为VECDRP模式，动物保护优先是国家公园生态系统保护的首要原则，行为分析法、栖息地适宜性评价是国家公园管理分区方法的关键，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基础是野生动物食物链完整性、行为空间连续性、栖息地生境原真性。国家公园二级分区明确

了国家公园的管控方向和目标^[10]，用途管制目标必须通过二级分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才能落实，刚性管控与柔性管控相结合。基于生态系统韧性的LAC管理指标体系包含生态韧性、体验韧性和社区韧性三类；保护与发展矛盾化解的三个基本策略是以时间换空间、以生态兴产品、以门户创出路，生物经济、健康经济、游憩经济、服务经济是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生态产业体系，以门户社区、特色小镇、友好发展带为空间载体驱动区域发展，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中心的区域绿色发展模式是国家公园价值实现的核心使命^[11]。（吴承照）

（7）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美国、印度、法国等国家自然保护地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关系可分为直接衔接、间接类型衔接、间接政策衔接、无衔接4类；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应遵循依法合理、保护第一、体制改革、科学评估4项原则，要结合长期存在的问题进行科学研究，使未来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过程更加科学合理；针对保护地交叉重叠的具体问题应打破行政区划桎梏、重视流域区划特性，优先整合重要生态保护区，先行优化“一地多名自然保护地”，建议按照“内嵌—相交—相接—邻近”的空间现象依次进行；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影响，必须从认识层面、法律体系、资金机制、管理体制、社区应对、科学研究等方面建构落实自然保护地体系^[12-13]。（庄优波、卢小冬、唐晓岚、钟乐）

（8）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搬迁实施后，居民收入总体增加、生活难题得到有效解决、卫生条件明显改善、住房安全得到充分保障、居民对国家公园认可度显著提升，存在问题主要是住房政策与实际需求差距、支出增加、生活质量有下降的风险、老村复

绿进展缓慢等，下一步需要进一步优化完善住房政策、持续拓宽就业渠道、提高补偿力度、引导居民融入社区、加快老村复绿、定期开展跟踪评估。（李想）

（9）需要全面认识旅游业在解决人兽冲突问题上的作用，旅游业对辐射范围内的社区缓解效果相对较好，但这种以经济利益交换保护态度的缓解方式具有时空上的不均衡性，存在旅游业经济产值有限、经济利益分配不平等、分配空间不正义、注重长远利益基础设施建设而忽视短期生计等问题；不当的开发方式会导致生态负面效应，生态补偿亦可能造成反向激励，从而使旅游业加剧人兽冲突；生态产品价值的多途径实现是生态空间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支撑，可以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可持续保护。上海郊野公园以大面积农业用地为特色，如何丰富农业空间生物多样性，挖掘农业景观的复合价值，实现农业与社会发展双赢格局是景观规划设计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14]。（崔庆明、吴志文、袁晶）

（10）建议赋予国家公园管理机构空间管控权，并且将入口社区划入国家公园用地^[15]，方便保护地社区搬迁和用地整体调控，保障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开展统一管理；地方发展是调动保护积极性的重要原因，自然保护地监管不能“一刀切”，提倡适应性管理，目前存在自然资产变现不足的问题，随着国家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生态绿色需求将上一个新的台阶，应该进一步探索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实现区域绿色协同发展；保护地的申报不仅是当地也是全域的责任，既存在生态建设区、生态示范区，也存在生态压力区，通过区域各尽所能，推动具备生态优势的区域主动申报保护地，获得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金云峰、任文伟、吴伟）

2 新技术在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管理评估中的应用

（1）自然保护进入智能时代，建立基于中国标准的生态监测信息通讯网络，打造生态系统的数字复制体，赋能态势感知与决策推演，实现传统GIS手段无法达到的管理效果。以数据驱动提升生态系统管理专业化能力和精准化水平。主要关键技术：基于人工智能的野生动物音视频识别技术，自然之耳——生态系统AI声纹监测技术；基于人工智能的野生动物音视频识别技术，哨兵之眼——野生动物AI视频监测技术；基于数字孪生的生态系统管理决策技术——数字孪生技术，生态大脑——保护管理决策推演技术，打造集体验、学习、分享、疗愈等功能于一体的自然元宇宙^[16-17]。（雷光春）

（2）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立14 000 km²天地空实时监测体系，试点前东北虎分布在边境线5 km附近，现在分布在50%面积范围，幼虎存活率50%以上，95个基站、3万台红外相机，实时传递、识别、预警，一个数据平台上办公，森林公安执法效率大大提升。监测信息同样可以服务社会，引起全民关注。（冯利民）

（3）结构复杂性是生物多样性的三大基本特征之一，体现在光水资源分配、动物栖息地、植被扩散策略、物种竞争与共存机制等方面，植被冠层结构复杂性与植物物种多样性间存在正向关系，共同促进植被生产力提高。激光雷达是通过测量光脉冲从发射到返回接收机的时间获取目标的空间位置，可获得精确三维空间数据，在获得植物精细结构参数方面具有优势。在跨尺度森林冠层参数估算中的突破应用，主要是实现了中国30 m分辨率的森林高度制图和森林地上生物量产品的高精度绘制，在众源数据支持下

绘制中国新一代植被图。从20世纪80年代到2015年,中国自然植被群落复杂度整体上呈现一个下降趋势,虽然中东部区域可以看到显著的植被“变绿”的情况。(苏艳军)

(4)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监测指标SDG11.4.1“保存、保护和养护所有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人均支出总额”,结合中国世界遗产地监测指标研究提出二项拓展性指标:单位面积支出和人为干预度。自然遗产地人为干预度指标能反映自然遗产的人为干预程度,可以更好地评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状态。基于地球大数据的人为干预度为面向全球尺度的自然遗产地监测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指标方法,具有全球可比性。基于中国39个世界遗产地研究,中等以上发展水平的自然保护地占总数51%,近半数自然保护地单位面积投入资金偏低。(杨瑞霞)

(5) 基于GIS的网络数据、手机信令数据、问卷访谈数据等大数据分析在旅游规划、游客行为、游憩适宜性评价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荒野制图与荒野地连通性保护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础;生态价值评估是空间规划的重要支撑;情景规划与成本效益评估法在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中发挥积极应用;行为分析法对保护地管理分区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符号性规划工具使生物多样性成为政治生态过程的一部分;基于声纹识别的声景规划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健康舒适度提升具有重要意义。(翟宇佳、贾倩、王欣歆、张乾;曹越;李方正;廖凌云;彭婉婷;黄圣杨;许晓青)

3 长三角生态环境现状与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1) 建立“海湾—江湖—山河”六位一体的生态空间安全战略格局,通过技术模拟

和联动平台构建保障生态安全,同时也要做好生态修复与关键区域识别、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加快推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严格管控三大空间、完善生态环保机制政策并推动区域联动等措施。(王祥荣)

(2) 上海“十三五”水环境质量改善非常明显,但生态环境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全市中小河道好于Ⅲ类的优良水体比例总体较低;饮用水源地安全保障压力长期存在,4大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主要影响因素:上游来水、航运事故、特征污染物等;水生态存在安全风险,淀山湖现状Ⅴ类水,总氮、总磷超标,总体轻度富营养,蓝藻水华时有暴发,富营养化、自净能力、生物多样性指数下降、表层底泥中度(严重污染),岸线局部受水产养殖、建设用地侵占,生态自净功能退化,沉水植物大面积消退,土著鱼类种类减少。“十四五”治理坚持一河一策原则,重点任务包括系统谋划饮用水风险防控、城镇污水处理及管网建设、初期雨水污染控制、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河湖生态修复等。(卢士强)

(3) 上海市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前是4类11处自然保护地(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分布在郊区城市边缘和崇明岛,其中崇明岛5处,浦东新区1处,松江区1处,奉贤区1处,宝山区1处,杨浦区1处,金山区1处,实际勘界总面积114 700 hm²。上海4类保护地4个部门管(林业、环保、海洋、农业),存在4方面问题:交叉重叠;四至边界不清晰;保护地与生态红线不一致;部分区域生态功能丧失。基于生物多样性重要性评价,上海还需建7个自然保护地,包括崇明北部、淀山湖西部、南汇东滩等,目前没有国家公园;整合优化后形成三类保护地,崇明地质公园被合并,中

华鲟与东滩合并,国家级保护地面积大大提高,整合前为8.20 hm²,整合后为11.27 hm²,整合前4类11个保护地,整合后3类8个保护地,占上海国土陆地面积16.8%。(薛程)

(4) 上海自然保护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管理法规效力等级较低、地方管理办法具体性规定不足、核心保护对象的研究深度有待提升等,应完善上海自然保护地管理的地方性立法、逐步做好与法规实施相关条件准备、开展生物多样性监测评估和生境优化技术研究;从上海世博棕地利用、上海江湾新城弃置地利用、湖南株洲市渌口区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及上海化工区绿化管护等项目实践,可以发现荒野纳入城市保护用地是非常必要的。(杨文悦;徐曦)

4 长江口国家公园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1) 近40年来长江口生态治理经历了三个阶段:传统自然地理治理模式(1980-2000年);区域生态系统管理模式(2001-2015年);全域生态文明治理模式(2016年至今)。长江口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基本格局是三级分叉四口入海,外来5个水团相互作用形成5大生态类型:冲积沙洲、滩涂湿地、浅海海域、河口海域、舟山长江口渔场,长江口浑浊带起到重要过滤器作用,人类活动对长江口的主要影响是河口大型工程包括护岸工程、货运码头工程等。对长江口的认识需要一个根本的转变,即从自然范式走向人类—气候范式,从江口水域走向陆海统筹,从发展范式走向管理模式。长江口的影响因素有水团、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长江冲淡水、东海海水、江苏沿岸流、黄海冷水团等是长江河口生态系统的主要5个水团。长江口水沙条件从三峡工程(2003年)后发生巨大变化,淤少冲多,季节不均。中国三大河口建设目

标应该是黄河口国家公园（典型自然保护型国家公园）、生态长江口（概念型国家公园）、珠江口国家公园（陆海统筹复合型国家公园）。（叶属峰）

（2）长江口是长江与海洋生态系统交汇区域，生态状况直接影响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目前一些物种正处于濒危甚至灭绝状态。上海水生生物丰富多样，世界国际大都市罕见，鱼类370种，两栖爬行动物21种，大型底栖动物虾蟹类50余种，大型软体动物30余种，水鸟164种。长江口是水生生物的产卵场、育幼场、索饵场、江海间洄游通道、鸟类迁徙驿站。上海每年有全国有名的5大渔汛：刀鲚（3月洄游繁殖）、凤鲚（5-7月）、银鱼（2月）、白虾（5-10月）、冬蟹（10-12月），现在已经消失。长江口三鲜：鲥鱼、刀鲚、河豚；上海濒危物种中华鲟、白鲟、胭脂鱼、松江鲈。由于长江上中下游产卵场被破坏，上述多数鱼类已经灭绝，加强水生生物生境保护迫在眉睫，如重建修复生境、开展资源增殖、控制渔业捕捞、防止生物入侵、关注全球气候变化。（庄平）

（3）按照国际湿地公约分类标准，2021年上海市湿地总量4 581 km²，湿地保护率>50%，近海与海岸湿地占全市湿地比率80%，河流湿地2%，湖泊湿地1%，沼泽湿地5%，人工湿地12%。长江河口潮间盐沼湿地占全国25%，具有重要蓝碳储存价值。目前长江河口湿地总体淤涨，局部侵蚀，未来具有不确定性，特别是崇明东滩潮滩（1974-2020年）东扩133 km²，年均自然淤涨2.90 km²，1974-2020年横沙东滩由于深水航道疏浚土吹填新增120 km²，年均增长2.60 km²，2000-2020年互花米草面积增长79.01 km²，平均每年增加4.38 km²，海平面持续上升，上游来水来沙持续下降，主要水环

境指标超标。河口湿地保护地空间重叠，国际光缆、深水航道、水源地、保护地等是空间协同的关键，需要精细精准评价河口生态功能区/环境敏感脆弱区，科学动态调整生态空间功能区，加强大河口“天一空一地一岸一海”一体化智慧监测。（田波）

（4）长江口生态系统具有国家代表性和国家公园建设可行性，一是长江口处于长江下游重要的地理生态带，具有国家代表性的滨海湿地生态系统；二是长江口同时是中华鲟等濒危保护物种的关键栖息地；三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的重要节点，但目前地方对于长江口国家公园建设是否对国际航运有影响存在顾虑，这需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长江口国家公园的建设更加有利于长江口资源的统一管理，能使生态红线范围得到统一、规范、高效的管控，协调保护和发展的矛盾，推动发展方式绿色化升级。目前已完成长江口自然本底调研、保护地整合以及低碳政策，均为长江口国家公园建设打好了良好的基础，应“加大、加快、加强”长江口国家公园的建设，这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国际城市影响力有重要意义。长江口国家公园建设需要考虑保护与国家重大工程及产业、保护与经济高产出、以及在高密度区保护的三方面问题。（徐卫华；苏杨、张饮江；张浪）

（5）国家公园建设需要给出具体方案，才能争得各方支持。同时，还需考虑多个国家级和地方级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的范围统筹、管理类型统筹，以及陆海统筹。建议提供实际方案和报告，推动建设可行性论证。（徐丽娟）

5 关于太湖江南水乡国家公园建设的讨论

（1）黄浦江上游的东西苕溪有鲜明的流

域界限，中上游河段保留了较好的自然水文学节律、地貌形态空间异质性、水系三维连通性和良好的水质，体现了异质化生态系统较强的生态韧性，鱼类群落的食物网结构和生物多样性有较好的体现，东西苕溪多数河段健康处于三级标准以上，中上游河段处于二级水平的居多，土著种及珍稀种占比高的热点区应尽早纳入优先保护规划；东苕溪下游河段、东太湖、吴江河网水系水生态健康变化主要体现在：鱼类多样性指数、土著种占比、无脊椎动物食性鱼类个体百分比、敏感性鱼类个体百分比等指标下降，主要原因是人为干预导致水文地貌改变，生物多样性单一化，水污染及有机性底泥淤积河床。杂食性鱼类占比增加也反映出其典型的生态负响应。（李建华）

（2）以太湖为中心的江南水网系统，农业灌溉、交通运输、市场网络与人居生活融为一体，经历远古文明江海成陆、隋唐大运河军屯圩田、宋元明清京杭大运河、近代上海开埠与铁路建设等重要历史事件，沉淀了深厚的遗产资源，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生态系统^[18-19]。靠近太湖的桑棉种植与纺织业、嘉善北部的窑业、杭州湾北沿海的盐场与盐业是近代江南的三大支柱产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周庄为代表的江南水乡古镇保护开始起步，目前共有国家级、省级历史文化名镇52个，其中中国历史文化名镇37个，省级历史文化名镇15个，这些保护实体均是独立分散状态，缺少整体性保护，旅游特区与新城建设正在侵蚀文化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原真性。特别是传统水系的隔断截流是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江南水乡文化存续生长的基础，这是江南水乡文化保护和持续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20-21]。（邵甬）

（3）太湖江南水乡区域最重要的是水生

态系统、水网连通性的保护,这直接关系到长三角经济发达地区几千万人口的水源安全^[22-23]。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水系连通性差,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1年,仅示范区内总计有大型水坝8座,水闸139座,未持续连通的水域面积占比超过总水域面积的一半^[24-25]。该区域具有完整的亚热带水网湖泊生态系统和独特的生物多样性资源,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农业文明杰出典范地区,具有世界遗产价值和国家代表性,建设田园型国家公园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建设国家公园的必然选择,如同上海郊野公园建设创新探索一样。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其承担的最重要责任是参与国际竞争,目前以至未来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载体是什么?生态绿色,对于长三角地区来说,最紧缺的是融自然与社会生活于一体的大型生态公园,通过太湖江南水乡国家公园建设,为长三角都市群的持续高质量发展奠定绿色基石,注入生态品牌。在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以长江口国家公园和太湖江南水乡国家公园为绿核,有机融合城市经济带,创新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格局,共同驱动生态和经济发展,促进长三角核心区域成为国际最具竞争力的绿色发展区。中国国家公园在生态系统整体性保护理念下应该是多种空间形态与管理模式,在经济发达地区建设国家公园,其综合价值远远超越其他地区^[26-32]。(吴承照)

(4) 目前太湖流域水面率约为17%,水系统退化严重。通过国家公园建设将太湖流域环湖的自然保护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进行整合优化,形成一个串联的廊道和生态网络,构建环太湖缓冲带,促进整个区域的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维护区域整体生态安全。需注意处理区域的供水排涝和

环境安全之间的关系,近几年太湖以及其下游的黄浦江高潮位屡破警戒水位,流域协调机构不能缺席,需发挥流域内协调作用,在功能区进行对接,边界进行衔接,对监测标准和法规进行统一,更好地推进江南水乡国家公园建设。(杨凯)

(5) 南京林业大学陈植教授20世纪30年代也曾提出太湖国家公园方案,日本国家公园建设也是经历一个思想认识变化的过程,太湖地区最重要是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景观的保护,通过建立国家公园能实现整体性、连通性保护。虽然目前首次提出还需商榷,但未来20年随着国家公园建设的推进可能会提上日程,未来也可以考虑法国国家公园生态联盟的形式。(张玉钧)

(6) 水资源、水文化、水环境、水生态是太湖江南水乡区域最大的价值,长三角一体化规划缺少了生态真正的内涵,缺乏生态安全性整体考虑,建议针对这个区域,开展水生态专项规划,体现水生态的价值,促进长三角生态一体化的实现,建设国家公园是一条可行的途径。(张饮江)

(7)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水脉是该地区发展的核心。太湖作为高密度人口地区,目前已经濒临承载力极限,未来人口增长趋势将放缓,建议可以考虑太湖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人居环境未来建设的示范模式。建议从国家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角度进行思考,江南水乡符合国家文化公园建立标准,有成为国家文化生态实验区的巨大潜力。(王忠杰、闵庆文)

(8) 国家公园目前定位相对明确,需从国家生态系统重要性、原真性和大面积代表性在有限的国土空间考虑整体布局。自然保护地体系还包括不同类型保护地,自然保护区更适合于小范围的严格保护,自然公园能

够更好地融合人类生产生活。建议不仅强调以国家公园的形式,也可以通过自然公园的形式实现共同保护。(解焱)

6 总结

从2016年到2022年,对国家公园的认识逐步走向统一,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国家公园的目标是创新国土空间绿色发展模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国家公园管理机制是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化机制,全民参与共享的社会化机制是基础,市场化机制是重要补充,国家公园的空间布局不仅仅是单一的生物多样性指标,同时要考虑国家公园的社会价值和区域价值,国家公园的综合效益是国家公园空间布局的重要依据,在经济发达地区通过国家公园建设来加强区域绿色竞争力是未来的国际发展趋势。

加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的分类分级体系建设,明确各类各级保护地的性质与功能及其界定标准是当务之急,使得大家的讨论建立在统一共识的平台上;建立自然保护的全域观,城市、乡村田园荒野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同等重要,需要加强城市与乡村荒野保护地建设。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EB/OL]. (2021-10-12)[2022-08-19]. http://www.gov.cn/xinwen/2021-10/12/content_5642048.htm.
-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EB/OL]. (2019-06-26)[2022-08-19].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6/26/content_5403497.htm.

- [3] 自然资源部. 基于自然解决方案全球标准中文版及中国实践案例发布[EB/OL]. (2021-06-24)[2022-08-19]. https://www.mnr.gov.cn/dt/ywbb/202106/t20210624_2659274.html.
- [4]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EB/OL]. (2022-06-24)[2022-08-19].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6481006332569450&wfr=spider&for=pc>.
- [5] 韩念勇. 从中国的实践, 体会生物圈保护区的核心理念[EB/OL]. (2015-3-17)[2022-08-19]. http://www.mab.cas.cn/bhqdt/201503/t20150307_283033.html.
- [6] 朱春全. 迈向自然受益的商业未来——新自然经济的进展和趋势[J]. 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 2022(Z2): 48-51.
- [7] 曾楠, 徐东梅, 张小全, 等.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推动自然受益型经济发展[J].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 2021(7): 20-25.
- [8]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自然保护区管理评估规范(HJ 913-2017)[S]. 2017.
- [9] 肖能文, 赵志平, 李果, 等.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生物多样性调查和评估方法[J]. 生态学报, 2022, 42(7): 2523-2531.
- [10] 唐小平. 国家公园规划制度功能定位与空间属性. 生物多样性[J]. 2020, 28(10): 1246-1254.
- [11] 吴承照. 国家公园是保护性绿色发展模式[J]. 旅游学刊, 2018, 33(8): 1-2.
- [12] 张书杰, 庄优波. 管控视角下生态空间与生态保护红线关系研究[J]. 生物多样性, 2022, 30(4): 10.
- [13] 荣钰, 庄优波, 杨锐. 中国国家公园社区移民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 中国园林, 2020, 36(8): 36-40.
- [14] 崔庆明. 旅游能缓解保护地人与野生动物冲突吗?[J]. 中国生态旅游, 2021, 11(5): 663-675.
- [15] 吴承照, 汪长林. 国家公园入口社区性质、发展特征与政策需求[J]. 中国园林, 2022, 38(4): 14-19.
- [16] 魏钰, 雷光春. 从生物群落到生态系统综合保护: 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的演变[J]. 自然资源学报, 2019, 34(9): 1820-1832.
- [17] 郑宇梅, 沈洁, 雷光春. 湿地生态系统管理: 热点领域与研究方法[J/OL]. 世界林业研究, <https://doi.org/10.13348/j.cnki.sjlyyj.2022.0065y>
- [18] 刘士林. 江南与江南文化的界定及当代形态[J]. 江苏社会科学, 2009(05): 228-233.
- [19] 阮仪三, 袁菲. 从守护到传承——江南水乡古镇保护实践30年[J]. 中国名城, 2016(07): 4-7.
- [20] 邵甬, 陈欢, 胡力骏. 基于地域文化的城乡文化遗产识别与特征解析——以浙江嘉兴市域遗产保护为例[J]. 建筑遗产, 2019(03): 80-89.
- [21] 张兵. 城乡历史文化聚落——文化遗产区域整体保护的新类型[J]. 城市规划学刊, 2015(06): 5-11.
- [22] 魏嵩山. 太湖水系的历史变迁[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79(02): 58-64.
- [23] 陈荷生. 太湖流域水资源保护理念和战略[C]//太湖高级论坛交流文集中国水利学会会议论文集. [出版者不详]. 2004: 12.
- [24] 靳川平, 刘晓曼, 王雪峰, 等. 长江经济带自然保护地边界重叠关系及整合对策分析[J]. 生态学报, 2020, 40(20): 7323-7334.
- [25] 赵艳民, 秦延文. 基于 PSR 的长江口生态系统的健康评价[J]. 环境工程, 2021, 39(10): 207-212.
- [26] 陈植. 国立太湖公园计画书[M]. 北京: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 2016: 1-36.
- [27] 居易. 关于设立“太湖国家公园”的建议与构想[J]. 苏州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01): 6-12.
- [28] 周世锋, 张旭亮. 沪苏浙协同共建江南水乡国家公园体制机制研究[C]//2016首届生态文明与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中国建筑出版社, 2016: 310-314.
- [29] 董禹, 陈晓超, 董慰. 英国国家公园保护与游憩协调机制和对策[J]. 规划师, 2019, 35(17): 29-35.
- [30] 徐菲菲. 制度可持续性视角下英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和管治模式研究[J]. 旅游科学, 2015, 29(03): 27-35.
- [31] Lake District National Park Authority. Lake District National Park Core Strategy including Proposals Map[EB/OL]. 2010[2021-9-3]. <https://www.lakedistrict.gov.uk/planning/planningpolicies>.
- [32] Exmoor National Park Authority. Exmoor National Park Local Plan 2011-2031[EB/OL]. 2017[2021-9-3]. <https://www.exmoor-nationalpark.gov.uk/planning/planning-policy/local-plan/local-plan-2011-2031-summary>.